

土地出让收入为何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日前,一则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将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消息,引来社会关注。一时间,“土地出让金取消”“土地市场和房价将被影响”等解读在网络上被热议。此次征收划转用意何在?“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

深化非税收入征管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举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日前联合发布的通知明确,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实际上,此举主要是为了落实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举措。”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说。

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划转社会保险费和非

税收入征管职责”正是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正是按照这一路径不断改革。自2019年以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多项非税收入已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北京、上海等多地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费也已交由税务部门征收。

在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看来,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后,征管效率有望进一步提高,资金透明度、规范性也将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提

高财政资源的统筹能力。

“近年来,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得到优化,税收征管的信息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是大势所趋,此次划转顺应了这一趋势。”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说。

他表示,税务部门在征税的同时征收政府非税收入,有利于发挥征税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的征管效率,助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征收范围、使用、管理等均不变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我国财政“四本账”之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统计显示,202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今年前4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1383亿元,同比增长35%。

“此次调整的是征收机构,而非土地出

让收入的归属权,与社保改由税务征收是一个逻辑。”罗志恒表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仍属于地方收入,全额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支出仍通过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实际上,此次发布通知的第八条已经明确:“除本通知规定外,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征收划转将影响房地产市场?

析师张大伟说。

在罗志恒看来,房地产市场运行主要取决于土地供应量、货币金融条件和市场需求三大要素,而土地出让收入改由税务征收并不会根本上改变土地供给数量。

“从长远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都要求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罗志恒说,土地出让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应进一步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稳定的地方税体

系。

关于供地与住房这一公众关心的议题,今年已另有改革部署密集推进。

“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明确“路线图”。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通过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进一步细化土地征收

根据通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工作将自2021年7月1日起在河北、内蒙古等7地开展试点,2022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采取先试点后全面实施做法,可更好解决划转中或将遇到的一些问题,以积累经验、顺利推进。”杨志勇说。

在胡怡建看来,这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征收具有一定专业性。在下一步实际操作中,相关部门应加强沟通,强化专业人员的协调与配合,确保政策落地落实。

分账管理、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农等。去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一些专家指出,此次将土地出让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也有利于更好落实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程序,设立征收土地预公告制度,规范征收补偿,规定有关费用未足额到位的不得批准征收土地等。今年,各地探索控地价、限房价、竞品质的稳地价措施。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相关改革推进下,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等,都值得关注和期待。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肝炎防控须多措并举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专家建言消除病毒性肝炎

“乙肝和丙肝感染后所致疾病是我国疾病负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是我国医疗卫生的优先任务之一。”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监察专员王斌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消除病毒性肝炎行动”分论坛上说。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肝炎病毒感染者人数多,消除病毒性肝炎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防控成绩显著但仍面临不少挑战

“2002年,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05年,乙肝疫苗实现全免费接种;2009年至2011年,15岁以下儿童进行乙肝疫苗的普查普种,没有接种的进行了补种……”王斌介绍,通过一步步努力,我国在控制病毒性肝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乙肝疫苗接种从纳入免疫规划以来,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从高于10%下降至0.32%,从源头上遏制了乙型肝炎的流行。

在治疗领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教授任红表示,近年来,新的乙肝治疗药物已被写入防治指南,并被广泛应用,可

有效控制病情,能大幅减少肝硬化和肝癌细胞癌的发生。

“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病患的基数非常大,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王斌说。

我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极大地控制了肝炎新发感染。但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0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显示,病毒性肝炎依然是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报告病例数最多的乙类传染病。

中国科学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福生表示,病毒性肝炎不仅对患者危害性极大,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理事长王宇表示,我国已经具备了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的主要条件,关键是要通过社会动员,有效实施各种防治措施。遏制肝炎传播,减轻疾病负担,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防治病毒性肝炎需从源头抓起

如何防治病毒性肝炎?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说,早筛、早诊、早治,所有的传染病都可以根据这三方面来进行防治。

为抑制病毒性肝炎的传播,向着消除

病毒性肝炎目标迈进,我国提出了一系列肝炎防治政策。比如在2017年,11个部门联合发布《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2017—2020年)》,全面防治各类病毒性肝炎;2019年,我国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加强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努力控制和降低传染病流行水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王贵强介绍,我国连续发布《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旨在提醒大家做好预防和治疗,有效的治疗可以降低疾病的负担,减少肝硬化、肝癌的发生,减少中末期事件的发生。

“尽管我们采取了那么多措施,目前我国乙肝早诊率还是非常低,诊断率只有19%,治疗率只有11%,诊疗缺口还是非常大。”李兰娟说,“许多人对乙肝认识还是不足,认为乙肝不能被治愈,所以有的人就不去治疗甚至停药。”

王福生说:“我们团队发现,儿童慢性乙肝治疗得越早效果越好。我们最近对500多例过去十年治疗的1岁至6岁病人研究发现,如果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临床治愈率可以达到70%至75%。”

李兰娟建议,下一步应加大健康体检的支持力度,对没有检测过乙肝的人群进行检测。如果是感染者,需要治疗的尽早治疗;如果是易感者,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去打疫苗。这样就能大幅度降低新发感染率。

提高创新药物可及性减轻患者负担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徐小元在“创新促进健康——提高创新药物的可及性”分论坛上表示:“病毒性肝炎诊疗的关键是降低病毒对人体的长期危害,从而减少肝炎相关肝硬化、肝癌的发病和死亡率。”

王贵强认为,慢性乙肝的治疗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长期抑制乙型肝炎复制,减轻肝细胞炎症性坏死及肝脏纤维组织增生,延缓和减少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失代偿、肝癌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对部分适合的患者,应追求临床治愈。

创新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是减少肝炎疾病负担的有效手段。近年来,随着创新抗病毒药物的普及,丙肝感染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显著降低。徐小元表示,2018年,国家医保谈判将三种丙肝直接抗病毒药物纳入全国医保目录,药价降低85%以上。

“国家通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方式,大幅降低了乙肝抗病毒药物的价格,大大提高了药物可及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教授贾继东说。

徐小元表示,希望乙肝抗病毒药物的可及性能进一步扩大,从而推进病毒性肝炎的整体防控取得有效进展,真正实现从临床个体有效到人群总体健康。

新华社青岛6月9日电